

為了尋找出路，應該反省我們觀照世界的理論視野。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看到甚麼取決於我們如何去看，用甚麼樣的理論去看。「要想恰當地理解目前的歷史時刻，就需要一種系統的、包容性的社會理論，這種理論必須具有古典現代性理論……的那種實踐意向。一種批判社會理論既要提供關於當前時刻的理論，同時還要對當前社會的形成過程作歷史性的說明。它應……將理論建構同經驗研究相結合，同

時還應將微觀理論和宏觀理論統一起來。」(貝斯特[Steven Best]、凱爾納[Douglas Kellner]著，張志斌譯：《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頁377)但這種前景是目前的後現代理論無法提供的，相反，現在後現代主義者開出的反對宏觀理論與宏觀政治的處方，「具有癱瘓理論與政治之危險，應予以放棄」(同上書，頁381)。

新社會史首先是歷史

● 瞿 駿

在叫好者看來，《事件·記憶·敘述》一書展示了新社會史的勃勃生機，而對批評者來說，看不懂的新名詞、搞不清的洋理論、西化的語言系統構成了這本書的主體。某位書評作者說新社會史就像是一個辮子已剪、長袍未去的假洋鬼子。筆者以為，新社會史首先是歷史，歷史論文有其學術規範和標準，如資料是否扎實等等。



孫江主編：《事件·記憶·敘述》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事件·記憶·敘述》可能是一本頗為叫好的書，但也可能是一本招來不屑和批評的書，其命運或許會類似於《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和兩大本極厚黑的《新史學》。在叫好者看來這本書展示了新社會史的勃勃生機，收錄的一篇序言、九篇研究論文和三篇研究動態評述

都有獨到的眼光和新穎的見解。而對不屑者、批評者來說，看不懂的新名詞、搞不清的洋理論、西化的語言系統構成了這本書的主體，按照某位書評作者的概括：新社會史就是一個辮子已剪、長袍未去的假洋鬼子。對上述意見筆者以為：新社會史首先是歷史，對於歷史論文總有一些相對不易的標準去評價。比如學術規範是否到位，資料是否扎實等等。其次在序言中主編已經對他所理解的新社會史提出了很明確的三點，即：第一、放棄構建整體史的野心；第二、實現歷史認識論的轉變，兼顧產生文本的語境和後現代主義解讀文本的觀念、方法；第三、擺脫以美國中國學為中心的中國研究。因此這三點結合相對不易的標準當是我們評價此書的關鍵所在。

三點理解初步到位

通觀全書，主編孫江先生對「新社會史」提出的三點理解是初步到位了。所謂「到位」是指上述理解在各篇文章中均有所體現。以放棄整體史野心論，「街頭政治」專注於蜀中成都一隅，「地方精英」則着力在星星之火初生的江西山區，而「公共記憶之場」則凸顯在小小的岳王廟。但卻都能以小見大，用非整體史的做法回應了諸如「市民社會—公共空間」、中國革命為何發生？歷史記憶如何構建等具有普遍性的問題。

以實現歷史認識論轉變論，事件一編關注複數和小寫的事件，而

記憶一編看重歷史記憶主觀建構與客觀繼承的混雜變遷，疾病與醫療空間一編試圖凸現敘述之於史學的意義。而這些對歷史學的認識在注重因果關係，以還原歷史客觀為最終目標的科學史學那裏是無法想像，也是難以做到的。同時書中的大多數論文也並沒有滑到「歷史即文本」的另一頭去。憑史料說話仍是這些論文的底線。

以擺脫美國中國學為中心的中國研究論，我們可以看到法國大革命史的研究傳統（見王笛文），日本社會史的「某種」（偏文化人類學一路）研究方向（見上田信、森正夫、山本幸司文），英國人類學傳統（見麻國慶、楊念群文），台灣對於疾病醫療史研究之努力（見余新忠文）的鮮明痕迹。同時美國中國學的傳統也並沒有偏廢，甚至還有「搭配」。比如江西山區地方精英與革命之關係就運用了美國中國學很常用的精英理論來進行分析（見韋思諦〔Stephen Averill〕文）。而奧爾森（Mancur Olson）的集體行動理論在美國中國學界稀見學者使用，但被套入了1905年抵貨運動之研究（見王冠華文）。

「初步」則是指全書有不少論文還存在許多可以商榷改進之處，而要真正能將三點理解全部體現出來，那些相對不易的標準與史學方法論的思考相比同樣重要。

不易標準差強人意

全書學術規範與史料運用比較到位的有王笛、黃東蘭、韋思諦和

在《事件·記憶·敘述》一書中，學術規範與史料運用比較到位的有王笛、黃東蘭、韋思諦、楊念群的論文，其餘文章或多或少存在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是缺少應有的學術史回顧。以田海文為例，一篇討論中國文化暴力的論文中竟然沒有引用一篇中文的原始文獻。第二大問題則為題目大、時間跨度長、原始史料的相對缺乏之通病。

孫江認為「秘密結社」是以模擬親屬關係為紐帶的社會結合；而在古代中國，維繫親緣關係的紐帶並不是「血」，而是「氣」，「氣」的表徵為「骨肉」。這當然是很新穎的論點，但至少需要一部關於中國古代有關「血」的思想觀念史來作為支撐，否則就無以解釋「血濃於水」、「血親」、「血緣關係」等觀念是怎樣扎根於現代中國社會的。

楊念群的論文(社會史研究動態一編不在考察範圍之列，因為其並非專題研究)，其餘文章都或多或少存在以下兩個問題。

首先，因為很多文章沒有具體寫作時間，所以很難判斷其學術史回顧是否到位。以王冠華文為例，如果寫於2004年，說歷史學家對這場運動研究有限(頁61)的結論恐怕就要修正。何況即使「有限」，在國內《歷史研究》也在1997年前就發表了三到四篇專題研究。《近代史研究》也有一至二篇，怎能存而不論？(可參見黃賢強：〈海外華人與近代中國：1905年抗美運動研究的新視角〉一文的學術史梳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四期。)

至於能確定寫作時間的幾篇論文也同樣缺少應有的學術史回顧，基本都以「有限」或「沒有」為名而輕易放棄之。上田信、田海、孫江的文章都有類似問題。以田海文為例，一篇討論中國文化暴力的論文中竟然沒有引用一篇中文的原始文獻、中文的相關研究論著，不免令人費解。

第二大問題則為「上窮碧落下黃泉，先秦晚清皆得見」，誠然「抵貨運動」、「被展示的屍體」、「暴力」、「想像的血」大概都是呈現新社會史「邊緣性課題」的不錯選擇，但一加上「中國人民」、「從當代到明清」、「中國文化」、「從先秦到清末」，就與好文章間的距離拉遠了。題目大、時間跨度長、原始史料的相對缺乏是這幾篇文章之通病。

以孫江文為例，他一方面認為「秘密結社」是以模擬親屬關係為紐帶的社會結合；另一方面又指出對「秘密結社」，清朝不斷禁止並予以彈壓(頁192)。由這兩方面的差異引出「血」的問題，當然非常不錯。但他只引了一條史料來說明清政府之彈壓，而這條史料就用錯了。「康熙十年的刑法寫道……」(頁193)，其註解為引自《大清會典》(雍正朝)《刑部·奸徒會盟》(頁210，註10)。這裏憑「雍正朝」三字即可判定其為偽註。清會典中自有《雍正會典》，但其記載為續康熙二十六年至雍正五年事，個別延至七年，怎麼可能有康熙十年的記載？此其一。

其二，孫江文的基本預設是把「骨肉」和「血」這兩個概念的比較闡發，指出「血濃於水」、「血親」、「血緣關係」等觀念雖然業已扎根於現代中國社會，但在古代中國，維繫親緣關係的紐帶並不是「血」，而是「氣」，「氣」的表徵為「骨肉」(頁197)。這當然是很新穎的論點，但至少需要一部關於中國古代有關「血」的思想觀念史來作為支撐，否則就無以解釋「血濃於水」、「血親」、「血緣關係」等觀念是怎樣扎根於現代中國社會的。可惜並沒有這樣一本著作，孫江自己也沒有做清晰的觀念史梳理工作。因此對於他的基本預設，筆者感到比較難以站得住腳。

其三，頁210註18云：「本文所使用的《周禮注疏》、《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等文本，皆出自北京大學2000年版的《十三經注疏》。」

而同頁註20云：「楊伯峻：《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八年，中華書局1981年版。」出現此種自相矛盾，在筆者看來可能要歸結於作者治近代史，而對先秦文獻不夠熟悉之緣故。

餘 論

全書作者中除幾位日本學者外，基本都屬於近年來中國史學界崛起的新銳人物，其中不乏因對史學方法論的深刻反思而得大名者。和他們的博士論文相比，書中收錄的論文確已見到長足的進步。有的作者當年可以很明顯地發現照搬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 刻下的痕迹，而現在居然以成都的街頭巷尾作為解剖麻雀的場所，運用了大量第一手史料，並吸取不同研究傳統中的營養，將辛亥前後動盪時期裏國家、改良精英、平民群眾間的離合、聚散、反抗、妥協等情境分析得絲絲入扣，為政治史與社會史相打通做出了一個不錯的範例。有的作者當年研究儒學地域化這樣的開山課題，難免被人批評為導言雄心勃勃，但內容卻有辜負導言之嫌，在史料運用上亦曾遭人詬病。但目前其關於疾病醫療史的研究，如果綜合理論和史料兩方面，國內還無人能出其右。其餘如黃東蘭等人的論文都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不過正如主編孫江所言：其「新社會史」之新與其說是特徵，不如說是努力目標。在筆者看來此語極為中肯。整體史也好，微觀

研究也罷；後現代也好，啟蒙話語也罷，新絕不意味着一切推倒重來，而是在各種學術傳統基礎上的超越傳承。孫先生可能在其三點意見中恰恰並未體現出海外幾位前輩華人學者論述中的某種既超越又傳承精神，而他們曾經為如何提出切合中國史語境的真問題，為中國學術優良傳統的薪火相傳作出過筆路藍縷之功。其中余英時先生論楊聯陞先生治史經驗一文，以寥寥數語卻集其大成，錄之以為結語，其曰：

楊先生的基本功力自然是在中國史學方面，他的每一項研究專題都是先在中國史籍方面積累了豐富的證據，然後才加以整理。這是繼承了清代以來中國樸學的傳統……大體上說，楊先生平時在一定範圍內博覽群書，現代社會科學的訓練則在閱讀過程中發生部勒組織的作用。讀之既久，許多具體問題便浮現腦際，而問題與問題之間的層次也逐漸分明，這時有哪些專題值得研究，並且有足夠的材料以供驅使，都已具初步的輪廓，然後他才擇一專題，有系統地搜集一切相關的資料，深入分析，綜合成篇。……總之，楊先生的論著都是讀書有得的產品，他所提出的問題無一不是從中國史料內部的真問題，不但有客觀的基礎而且具自然的脈絡 (參見傅傑：〈本書說明〉，載楊聯陞：《國史探微》[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誠哉是論！

全書作者中除幾位日本學者外，基本都屬於近年來中國史學界崛起的新銳人物。正如主編孫江所言：其「新社會史」之新，與其說是特徵，不如說是努力目標。此語極為中肯。整體史也好，微觀研究也罷；後現代也好，啟蒙話語也罷，新絕不意味着一切推倒重來，而是在各種學術傳統基礎上的超越傳承。